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第一任书记——李临铭

李临铭(1902—1959年),陕西省子洲人,中共党员。1926年9月,李临铭等受党指派到冯玉祥部国民军联军在兰州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途经宁夏(今银川市)时,与贺维新等人留下,同国民军联军中的中共党员马云堃等人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临铭到陕西定边,建立了中共定边县支部,任支部书记。1928年3月被捕入狱,5月获释,之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8月病逝。1986年12月,党组织为他平反。



李临铭。

1926年9月,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时任国民军联军第二师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的共产党员钱靖泉赴陕北与陕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吕振华、王兆卿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人赴兰州(途经宁夏)学习。这时国民军联军正分批经过宁夏开赴陕西,急需加强宁夏工作,支援部队过境。为此,钱靖泉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要求,将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开展工作。李临铭与驻宁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中共党员马云堃、贾一中共同建立了中共宁夏第一个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堃做常务工作,贾一中负责青年团工作。特别支部共有7名党员,其中3人负责党的工作(工运、青运、国运各有1人负责)。

为便于公开活动,他们同时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特别支部和县党部同在宁夏城鼓楼上办公。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建立后,组织关系上先属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领导,1927年3月后,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在宁夏地区有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开始。特别支部建立后,同国民军联军宣传队紧密配合,主要以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名义联合开展活动;国民军联军政治部抵宁后,又在政治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活动。在特别支部的组织和宣传下,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普遍建立了“列宁室”“中山俱乐部”,悬挂列宁和孙中山像,教唱《国际歌》,陈列各种进步书刊供群众阅读等。李临铭还利用集市,教群众唱《国际歌》,组织学生上街贴标语、发表演讲、画漫画、演活报剧等。寒假时,组织青年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分析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现状与原因,树立阶级斗争观念,提高了广大爱国青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还充分利用节日、纪念日或重大事件,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宁夏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国民军联军政治部的伏龙在玉皇阁上向游行群众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号召劳动群众联合起来,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游行中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昂,齐唱《国际歌》,表现了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团结的力量。晚上,举行了灯火晚会,各街道张灯结彩,人们手执灯笼、火把,全城沸腾,人心振奋。5月30日,又举行了纪念五卅游行的集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共产党员肖明、伏龙等人自编自演了话剧《顾正红》,当演到日本资本家杀害中国工人顾正红时,全场群众无比义愤,“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响彻云霄。

在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宁夏城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先后建立,

这些群众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如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开展了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男女平等、监督妇女放足、反对落后的社会习俗等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活动。还组织群众控告贪污官吏,打倒土豪劣绅,伸张正义,反对封建压迫,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骨干,李临铭领导下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配合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在宁夏城举办了马列主义训练班。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学员们讲课,为中学和师范学校中的骨干分子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和爱国主义进步思想。

1927年春,在中共陕甘区党委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学院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人才”为教学宗旨。该院名义上是国民党所办,实则完全由共产党领导。院长刘含初、副院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等人都是中共党员。为了给宁夏培养革命骨干,李临铭从各中学选拔进步青年袁金章、雷启霖、李雨村、张子宽、刘廷栋等人到中山学院学习。这些青年后来都成了宁夏地区的进步人士和政协领导骨干。

1927年4月,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9月,国民党开始在宁夏地区进行“清党”运动,中共党员被驱逐,各群众团体被解散,《中山日报》被查封。特别支部书记李临铭等同志离开宁夏返回陕北定边。大革命时期,在宁夏发展的共产党员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由此解体。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它在宁夏传播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火种,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宁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序幕。(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何以能走深走实

赵占魁,原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工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特别提及在革命战争年代,“边区工人一面旗帜”赵占魁等劳动模范,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带动群众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

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各公营工厂组织开展赵占魁运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合力推动赵占魁运动在边区各工厂走深走实,在培育新式职工、促进边区工业建设、支援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榜样效应

《解放日报》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总结提炼“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赵占魁精神,成为引领边区工人争当模范工人的精神旗帜。为了使工人更好地掌握精神见行动,边区总工会及时提出赵占魁模范工人标准:一是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是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是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四是爱惜工具、节省材料;五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是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是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1943年二三月间,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下到农具厂蹲点指导推进赵占魁运动,进一步调动先进职工参加运动的积极性,帮助他们订立岗位生产计划开展生产竞赛,为边区各厂作出示范。邓发特别重视发挥时任翻砂股长赵占魁的榜样作用,指导他带头在各方面提高标准,订立了9条生产计划,并依计划向全边区工厂工友发出竞赛挑战。如在生产上,提高化铜罐子化铜次数,从4次提高到6次;培养学徒李有贵到11月份能单独看炉化铁。在意识修养和工作态度上,把节省的工资购买的4头猪11只羊(共值5000元)交公家经营,以百分之五十生利归工厂工人作为文化娱乐之用。4月9日《解放日报》公布赵占魁的生产竞赛书和生产计划,在边区工厂引发热烈反响,一个月左右时间工厂职工参加赵占魁运动人数大幅增加。

在1944年5月召开的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共评选奖励226名工业战线的劳动英雄,赵占魁当选为特等劳动英雄。大会要求劳动英雄和每个职工不仅要在技术上、生产上学习赵占魁,而且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学习赵占魁的革命品质。会后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工厂职工都应学习赵占魁,学习他不怕困难、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始终如一,胜不骄、败不馁,从来不为个人名誉地位打算的革命品质;学习他不断提高技术、改进质量、爱惜原料工具、教育工人学徒的精神。

不断深化实践指引

由于认识等方面原因,赵占魁运动一开始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1943年5月7日,邓发在《解放日报》发文《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纠正错误认识,并提出了具体方法和工作要求,特别强调我们一切工厂管理人员、职工会的工作者,应当共同领导这个运动,才能使这个运动巩固起来,坚持下去。此后,各工厂党、政、工干部和职工根据这个指示积极行动起来。

随着运动广泛深入开展,各工厂创造出不少好经验好做法,也呈现出一些新期待新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深化实践指引,不断推动运动走深走实。1943年年底,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召开后,赵占魁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1944年2月7日,《解放日报》发文《一年来赵占魁运动总结》,就今后如何坚持与提高赵占魁运动提出必须采取的六大举措:加强职工思想教育、进行经常的深入检查和定期总结、围绕每一时期的中心目标开展、依靠积极分子与团结群众、领导上的密切联系群众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职工会应努力改善自己的工作。此后召开的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又进一步深化完善了六大举措的部分内容,以增强操作性实效性,明确当年的中心目标是发展产量,改进技术、提高质量、节约储蓄,但在产量已达到高度标准的工厂,如化学、边纺、被服等厂,就应强调提高质量,产量还很低的则强调提高产量与质量。

1944年7月至11月,各工厂执行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决定,围绕把赵占魁运动提高一步、争取边区工业品全面自给这一目标,全面展开生产大竞赛。12月,边区总工会对生产大竞赛进行了深刻总结,指出“竞赛中又涌现出了不少新的劳动英雄,同时在竞赛中又给予赵占魁运动一些新的发展”,并就下一步坚持和提高赵占魁运动提出新的要求:发扬与推广运动中的新发展,培养群众中的新创造;领导上继续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发扬民主;必须培养教育劳动英雄;工厂的劳动英雄必须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政治文化水平,积极虚心地团结帮助群众。

倒逼后进迎头赶上

当赵占魁运动普遍进入巩固提高阶段的时候,却有少数工厂因各种原因始终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或发动起来又失败了,成为后进工厂。如何督促后进工厂跟上运动发展步伐,实现整体提高成为边区总工会需要迫切解决的突出问题。

1944年5月,边区总工会借召开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之机专门整理印发了两份赵占魁运动参考材料供与会人员讨论。一份材料通报了交通工厂、工艺实习厂两个运动的后进典型,总结回顾了这两个厂从1943年5月运动起步至今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段时间起起落落的详细历程,晒出了不少让人吃惊的细节。如交通工厂运动刚开始时,工人情绪很高,全厂半数以上的工人和学徒都订了个人计划,但过了一阵便低落下来,因为工会主任、厂长都没管事,影响了工人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另一份材料总结了近一年边区赵占魁运动开展情况,点名批评最为后进的交通工厂和工艺实习厂,并指出后进工厂有其客观原因,但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工厂在领导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凡在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的一定不能把运动真正发动起来,就是发动起来也一定会使运动中断。对于后进工厂应进行彻底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造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这两份材料极大触动了后进工厂特别是被点名批评工厂负责人的思想,不少同志会后回厂迅速组织自查整改。交通工厂厂长会后认真反省,下决心肃清官僚主义,努力迎头赶上。他们在运动中创新互助方式,实行生产变工制,组织工人中纺纱的与打合股的变工、制鞋鞋底工人中锥底底的与锥底的变工、打麻绳工人中打麻绳的与合股的变工,这样能互帮发挥特长,并互相督促,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还促进相互间的团结。这一做法得到了边区总工会的肯定和推广。赵占魁运动的成效在生产大竞赛中得到充分体现。当接到制革厂发出保证棉鞋质体能穿一年、消灭“礼拜鞋”的挑战后,全体职工立即讨论一致同意接受挑战。竞赛结果,交通工厂不仅消灭了“礼拜鞋”,而且在锥底的韧劲、鞋底的层数等指标上超过了制革厂。(据《学习时报》)

蒿店兵变——打响了固原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在宁夏固原县蒿店领导和发动了一次武装暴动,史称“蒿店兵变”。

1932年9月,在国民党陇东警备司令杨子恒部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蒋介石调拨给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部的一批武器弹药将运抵平凉,然后由其干部补习队押运兰州。当时,邓部的干部补习队中建有中共地下组织,有党员12名。

中共陕西省委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决定利用干部补习队中党组织的力量,组织兵变,夺取这批武器弹药,用以扩充和壮大陕北红军的实力。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良总负责,与干部补习队中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志学取得联系,共同实施这一计划。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指示陇东特委协同配合行动。

10月25日,补习队到达平凉,李良、刘杰三与国民

党干部补习队分队长、中共地下党员李华锋等接头后,建立临时党支部,商定在固原蒿店发动兵变,夺取枪支后撤向陕北,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

10月28日,国民党干部补习队从平凉出发,当晚宿营蒿店。党支部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午夜发动兵变。不料,行动被敌人察觉。李良、李华锋等不得不提前行动,带领军队中的党员和部分积极分子共34人撤到太白山。为防敌人追击,又派军队班长、共产党员李特生与党员苏冠英带领6名队员在山口设卡担任掩护,李良、李华锋带队向东北方向撤走。中途休息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华锋任队长,李良任政治委员。李特生、苏冠英等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天色已亮,未赶上队伍,与李良、李华锋等失去联络,于第二天傍晚潜回平凉。兵变部

难忘的罗家山战斗

张怀瑞

1949年6月,伴随着全面解放的胜利号角,我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奉命西进,协同西北野战军会歼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队,拉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宏伟帷幕。

回想起解放大西北的日日夜夜,眼前就浮现出罗家山苦战的情景,那横飞的弹雨,浸血的旗帜,战士们前赴后继冲向敌阵地的壮烈场面,都一一再现,如同发生在昨天。勇士们用热血和生命,铺平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在祖国解放的史册上,写下了鲜红的一页。

罗家山山地进攻战,不是一个孤立的战斗,它是整个任山河战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平凉、长武撤退的宁夏马鸿逵的十一军在此扼守,控制公路,掩护马鸿逵的主力一二八军北逃。

从地理位置来看,它和对面的鹞鹑嘴山形成一把钳子,封锁着任山河通往固原的公路,成为通向宁夏的门户。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乃是敌必守、我必攻的兵家要地。马鸿逵的十一军一六八师五〇四团据守山上,山上敌人筑成一道道马蹄形壕沟,交通沟环绕着,每个山头都构有支撑点,各点火力相互支援,形成了密集交叉的火力网,与附近的任山河村、鹞鹑嘴山和哈拉山连成一系列的纵深防御配备,阻挡着我军前进的道路。

当时,我担任罗家山主攻部队的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二团团长。

五七二团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红军部队,自1929年跟随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在广西百色起义后,南征北战几十年,经历过无数次战斗,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从进军大西北以来,全团指战员长途跋涉,飞渡黄河,一路上斩关夺隘,奋勇当先。

7月22日,部队由乾县出发,沿西(安)兰(州)公路,开始了著名的陇东八百里追击战,五七二团作为全军(六十四军、下同)的前卫团,像一把尖刀,紧紧地逼向敌人。

7月31日拂晓,尖刀连与敌骑兵接触。8月1日凌晨,大部队沿镇(原)固(原)公路追击敌人至古城川,发现任山河地区有敌人构筑工事。

8月1日12时,全军向任山河守敌发起进攻。由野炮、山炮、迫击炮组成的强大炮火,猛烈地轰击着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掩护突击队展开冲锋。

五七二团奉命攻击罗家山。团指挥所设在敌

阵地前不远的一个小山头上。

部队正在向罗家山展开勇猛的攻击。不一会儿,我接到报告:“三营已攻占了罗家山的警戒阵地,正在向主阵地冲击。”好样的,真痛快,照这样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就能解决战斗。”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此时,雄壮的冲锋号和清脆的枪击声,在山谷中交织回荡,仿佛是一曲壮美的交响乐。

可是,没过多久,山上的冲锋声渐渐减弱,枪声也零落起来。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敌人从山上打来的炮弹落在指挥所旁,掀起的气浪将土块劈头盖脸地打来。不时从前面抬下伤员,更增添了我心中的焦虑。我不由地掀起帽檐,拉开衣襟,频频看表。忽然,电话铃声剧烈地响起来,我猛然抓起话筒,耳边传来三营营长刘东起急切的声音:“我们正向敌主阵地运动,八连被一道深沟和敌侧射火力所阻,伤亡很大,攻击受挫。”“什么!攻不动?”我紧紧握着电话筒,大声喊道:“迫击炮是干什么用的?什么?炮弹打光了!那就用炸药包、机枪、手榴弹、刺刀,如果半小时再拿不下来,我就把你这个主攻营撤下来!”

正在这时,师政治委员陈宜贵同志赶到指挥所。我向他简要汇报说:“三营打得十分艰苦,连炮排也上了刺刀,虽然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工事,但敌主阵地工事坚固,火力顽强,七连长牺牲了,八连、九连连长也挂了彩,全营伤亡将近一半。但他们士气还很旺盛,三营营长刘东起坚决不肯换下来。我已派二营从侧翼迂回,配合三营的攻击。”

陈政委听罢报告,担心三营伤亡过大,不能及时攻下罗家山,影响整个战斗的进程。我笑着向他保证说:“请政委放心,罗家山他们一定能拿下来。那个刘东起和我一样,都是不打败仗不罢休的硬性子。”

果然没过10分钟,前面的枪声又激烈起来,三营在刘营长的重新组织下,又向敌人发起了猛攻。

此时,罗家山上,敌人的十几挺轻重机枪还在疯狂地扫射着,一串串子弹发出嗖嗖的嘶叫声,在阵地前沿组成密密的火网,封锁着三营前进的道路。八连伤亡很大,全连已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建制班,仅有的五挺机枪打坏了四挺,六〇炮弹也打光了。英雄的八连,只剩下三十几人,但他们不惧困难,以不怕牺牲,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指导员王震同志的率领下,又向敌人发

起了第四次进攻。机枪手王化兴操起唯一的一挺七九机枪,边拣敌人丢下的子弹边打。只见机枪在他怀里剧烈地摆动着一串串愤怒的子弹打得敌人不敢抬头。可正在这节骨眼上,机枪突然不响了!原来是连续射击几千发子弹的枪筒烧红了。在这关键时刻,王化兴急中生智,往机枪筒上撒了泡尿,机枪又嘎嘎地欢叫起来。

在机枪的掩护下,王震率突击队顺着敌人二、三道防线之间的交通壕,迅速接近主峰工事。这时,山下的炮火也及时地支援他们,趁着爆炸掀起的烟雾,战士们突然跃出战壕冲上去,敌人惊恐万状,慌忙投出一排手榴弹,当场炸倒我军十几个战士。仅剩下的十几名勇士,紧随着王震同志,闪电般地冲到敌阵地前,将身体紧紧贴在工事下刀削一样笔直的土壁上。敌人的一挺重机枪就在头顶上狂叫着,震落的泥土洒在勇士们的身上,激烈的火药味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趴在阵地前沿的三营指战员们,一个个都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紧张地观看着敌人工事的下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每一分钟,都给这些暴露在敌阵地前沿的战友们的生命带来巨大威胁!

突然,头顶上的敌重机枪停止了扫射——是五七四团的战友们,在攻下任山河村后,又向罗家山守敌的侧后,发起了进攻。指导员王震抓住这一难得的间隙,命令通信员爬到工事上,打掉敌人的重机枪。只见通信员一跃而起,未等敌人辨明情况,他手中的冲锋枪就发出了欢叫声,十几名勇士随即冲上前去,消灭了这个火力点,在敌主峰阵地上,打开了一道缺口,趴在阵地前沿的战友们,也全都从地上跳起,呼喊着,像洪水一样涌上来,战壕里满身泥土的敌兵,见解放军冲上来,仍负隅顽抗,端起刺刀冲过来,被战士们用冲锋枪一扫,又屁滚尿流地向山下逃去。炮排的战士们就用敌人丢下的迫击炮向他们轰击。

经过激烈的肉搏战后,阵地上摆满了敌人的尸体,到处流着泥浆一般的污血。一些未死的敌兵,纷纷跪在地上求饶,缴械投降。

登上罗家山主峰,凭高望去,可以看清敌人防御工事的全貌。为了从这蜘蛛网般的工事中,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我们多少个英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六辑)